

新时代中国政策试点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韦梅真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宁 530006)

摘要: 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政策试点的文献进行梳理,利用 CiteSpace 软件将其绘制成知识图谱并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政策试点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政策试点研究发文量不断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策试点的发生过程、政策试点中的央地关系、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政策试点中的创新扩散等内容。基于此,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未来政策试点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政策试点; 政策试验; 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 F832.6; F75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7-0287-06

中国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政策试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大量运用政策试点来促进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政策试点就被看作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公共决策的工具,抓好试点工作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政策试点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总概述,是中国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中国之治”的发展。

近年来,政策试点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奇迹”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显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策试点研究已成为学者认识国家治理的突破口,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政策试点研究,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然而随着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对政策试点的研究仍存在空白和盲区,因此,有必要对政策试点进行综述和反思,对政策试点的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具有深刻意义。

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2022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有关政策试点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对政策试点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进行探讨,进一步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

价值,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以 CiteSpace 6.2.R4 软件作为工具载体,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政策试点的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CiteSpace 软件是一项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研究者观察某一领域或某一研究的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对政策试点的可视化图谱进行分析,让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政策试点,更好地观察到当前政策试点研究存在的“黑箱”和缺陷,为政策试点的发展提供经验。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其作为中国知名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政策试验与政策试点都是政策反复执行与调整的过程,二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等同的^[1]。因此,以“政策试点”和“政策试验”为主题在知网进行高级检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步入了新的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因此本文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的 10 年,即 2013—2022 年,共检索到期刊文献 695 篇,剔除重复收录、主题不相关、要闻、资讯、无关键字等文献后,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北大核心期刊、AM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得到用于研究的有效文献共 197 篇。

收稿日期: 2024-04-25

作者简介: 韦梅真(1998—),女,广西贵港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2 结果分析

2.1 总体研究脉络

发文趋势是学术界对某一研究主题的关注度的集中体现。根据对 2013—2022 年检索到的 197 篇有效文献绘制成论文发文量趋势图,如图 1 所示。通过对发文量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可知发文量呈阶梯式递增的趋势,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政策试点的关注度在逐步上升,越来越多学者加入政策试点的研究领域。

2.2 核心作者分析

一般情况下,核心作者的确定通常需要关注论文的第一作者以及以独立身份发文的作者。参考普赖斯定律,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政策试点研究者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作者共现图谱(图 2)。通过对近 10 年发文的作者特征进行分析可知,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发文的最高发文量为 17 篇,则政策试点研究的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M_p 为 $M_p = 0.749 \sqrt{M_{pmax}} = 0.749 \times \sqrt{17} = 3.0888$ 。因此,本文界定的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3 篇,共 7 位,其中杨宏山发文量最多,约占总文献数量的 8.6%。

图 2 中,字体和节点的大小反映了作者的发文量,字体与节点越大代表着作者的发文量越高,而作者间连线的粗细以及连线的数量则代表了他们之间

合作的紧密程度。从研究结果分析得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对政策试点的研究,部分学者已形成研究网络,共同对政策试点进行研究。然而,尽管发文量较大的作者字体及节点较大,但与其他作者之间的连线较细,或者并无连线,几个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紧密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政策试点领域,核心作者之间几乎很少有学术上的联系。

2.3 政策试点领域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一篇科研文献的浓缩和提炼,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把握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2]。采用 CiteSpace6. 2. R4 软件对数据库中 197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将文献时间设置为“2013—2022”,时间切片单位设为 1 年,阈值设置 $Top\% = 10\%$,对得到的文献构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

2.3.1 关键词引用频次分析

表 1 显示,2013—2022 年,政策试点研究领域出现频次较高的是政策试点(71 次)、政策试验(61 次)、政策扩散(22 次)、政策创新(16 次)、央地关系(11 次)。

在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关键词节点数量 N 为 234,节点间连线数量 E 为 453,政策试点、政策试验、政策扩散、政策创新等以较大的字体出现,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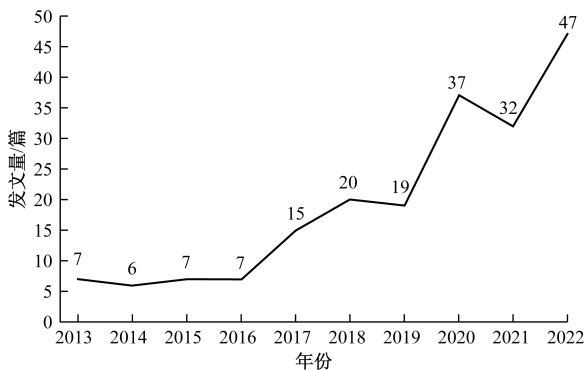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发文量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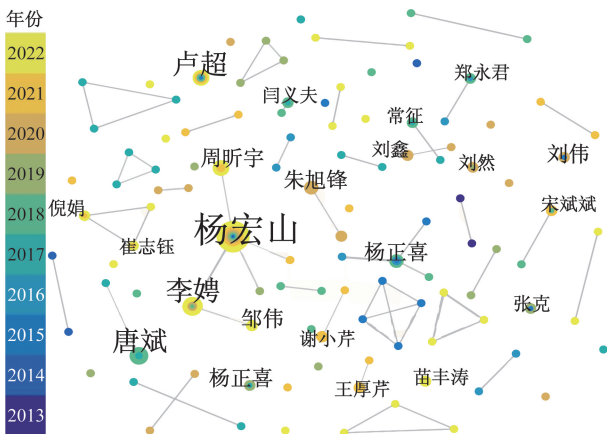


图 2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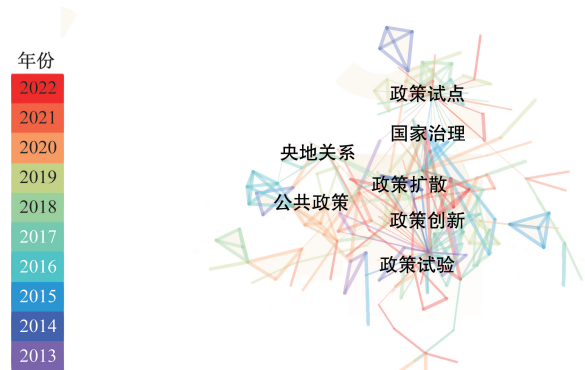


图 3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1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词频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	71	0.84	2013	政策试点
2	61	0.76	2013	政策试验
3	22	0.21	2013	政策扩散
4	16	0.09	2013	政策创新
5	11	0.08	2017	央地关系
6	5	0.05	2014	政策实验
7	5	0.04	2015	国家治理
8	5	0.04	2018	府际关系
9	4	0.04	2016	政策执行
10	4	0.03	2020	试点

表 1 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可知,字体大小与关键词引用频次呈正相关的关系。

2.3.2 关键词聚类视图分析

去除基本关键词“政策试点”“政策试验”后,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进一步分析政策试验领域的研究热点。对关键词网络通过对数似然算法(LLR)进行聚类,得出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4)。其中聚类模块值 $Q=0.6060$, Q 大于临界值 0.3,聚类结果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S=0.8901$, S 大于 0.7,聚类结果合理^[2]。因此,该聚类结果以及呈现的结构具有参考价值。

通过分析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聚类结果,构建政策试点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汇总(表 2),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各关键词的关联程度较高,聚类内部具有相似性,因此,将聚类划分为政策试点的发生过程、政策试点中的央地互动关系、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政策试点中的创新扩散 4 大类,得出当前学术界在政策试点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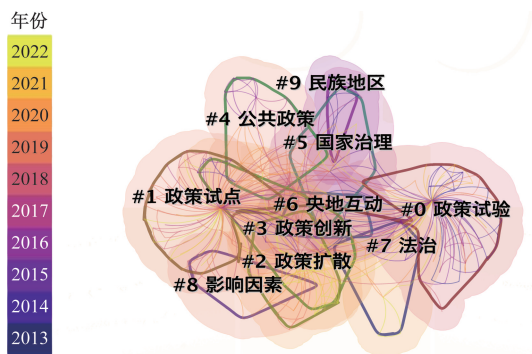


图 4 2013—2022 年政策试点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视图

表 2 政策试点领域关键词聚类汇总

聚类编号	轮廓值	聚类标签
# 0	0.990	政策试验; 政策试点; 自贸试验区; 政策扩散; 改革创新
# 1	0.933	政策试点; 政策试验; 文本分析; 智慧城市; 农村
# 2	0.895	政策扩散; 政策属性; 垃圾分类; 纵向推动; 新高考综合改革
# 3	0.780	政策创新; 央地关系; 中国; 国家政策; 公立医院改革
# 4	0.895	公共政策; 政策执行; 低碳城市; 行动情境; 租赁住房
# 5	0.849	国家治理; 基层治理; 多点运作; 示范; 项目制
# 6	0.906	央地互动; 政策过程; 中国特色; 研究评估; 地方政府
# 7	0.956	法制; 医院; 政策刺激; 分娩镇痛; 回应
# 8	0.974	影响因素; 荟萃分析; 扩散模式; 扩散过程; 创新扩散
# 9	0.989	民族地区; 制度壁垒; 政策实验; 土地流转; 政策试点

(1) 政策试点的过程。在政策试点的过程方面,韩博天和石磊^[3]在《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一文中对中国的“政策试点”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提出了“政策试验”说,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政策试点”的主导性研究视角。一个完整的政策试点通常包括 4 个环节,即基层创新、中央采纳、选点尝试和酌情推广^[4]。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试点的发生过程和运作机制展开研究。周望^[5]认为完整的政策过程应以启动环节的“先试先行”和推广环节的“由点到面”为关键进行试点解析,着眼于政策试点的启动过程,根据中央政府推动力与地方政府竞争力划分出争取、指定、追认、自发 4 种试点触发机制,认为试点过程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决定了政策试点是以何种机制启动的。刘伟^[6]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进行分析,对政策要素和政策过程进行重新整合,认为政策过程可以分为前试点、试点和后试点 3 个阶段,即地方自发-国家与地方自发相结合-结束试点,提出政策试点发生的三阶段论。杨志军^[7]基于当前政策试点的实践,提出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在该试点结构下,党中央统领元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由上到下有层次性递进,对试点政策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性。

(2) 政策试点中的央地关系。政策试点按照发起方的不同可分为中央授权型试点和地方主导的自主型试点^[8]。朱旭峰和张友浪^[9]从地方政府创新扩散出发研究政策试点中的府际关系,他将中央授权型试点和地方自主型试点看作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央和地方之间官员的政治流动对试点的结果有显著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将重心放在研究政策试点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桂华和夏冬^[10]在探讨政策试点的方法与条件中认为,政策试点高度依赖中央和地方的配合,中央和地方在动机上“做好自己”,在行为上“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中央和地方是否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是试点成败的关键。政策执行研究经历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整合型研究 3 种途径。在政策试点领域,刘志鹏等^[11]认为,政策试点是通过“自上而下”来利用权力位差进行政策“高位推动”的工具,作为政策试点阶段之一的“示范”,在上级政府部门高位推动的基础上为原本弱势的部门造势,为原本就强势的部门借势,从而形成动力势能使下级政府部门有效执行试点政策。基于“竞争申请制”下的政策

试点改变了中央政府在政策试点中的主导地位,打破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央地关系中的“碎片化威权”的认识,使地方在试点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模式^[12]。由于央地关系的复杂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策试点的核心议题,而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政策试点过程中如何求得平衡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3)政策试点中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近年来研究政策试点的新视角,是为了应对政策试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杨宏山和李娉^[13]认为,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过程可分为 4 个过程,即“已有知识的分享-概念性知识生产-地方性知识生产-系统性知识更新”,在知识生产视角下,政策试点成为一种组织学习路径,通过溯因推理和归纳推理开展试点并形成新的知识生产。开展政策试点需要构建包含多方主体的议题学习网络,而政策试点是否有效则取决于该议题学习网络。杨宏山和赵远跃^[14]对议题学习细分为愿景学习、试点学习、整合学习以及规范学习 4 个阶段,通过这 4 个阶段完成政策试点的知识转化。李娉和杨宏山^[15]以“垃圾分类”为案例,探讨知识生产运作逻辑以及技术测试、方案组合、回应学习、综合调试的运作模式,提出科学检验和多元协商的两种知识产生路径,为政策试点提供了微观视角。李娉和邹伟^[16]构建“权威调控-知识生产”框架,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论证了在权威调控下,知识生产有检验型、进化型、纠偏型和靶向型 4 种运作机制及其适用情境。在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行动主体通过多方互动与整合,通过议题学习网络形成知识分享,深化对政策议题的认知,降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政策试点的有效性。

(4)政策试点中的创新扩散。周望^[17]将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进行调适,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试点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并将创新成功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复制推广的过程,呈现“吸纳-辐射”的运行轨迹。作为政策试点的后置过程,政策试点中的创新扩散对政策试点能否成功复制推广的影响较大。李壮^[8]将政策扩散机制分为强调地方政府能动性的横向政府间关系和强调中央对地方主导型的纵向政府间关系,纵向创新扩散机制是理解横向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视角。中央和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互关系与程度是创新扩散中的显著特征。刘伟^[18]引入“智慧城市”的试点实践,认为政策创新中大量存在“跟风模仿”与“学习借鉴”并对二者的创新形式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上,李智超^[19]在对试点的推广

过程进行研究时发现,地方政府在试点的初始阶段处于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而当中央政府介入,地方难以判断中央的试点创新方向从而成为模仿者和跟风者。朱亚鹏和丁淑娟^[20]对政策属性是否会影 响政策扩散进行探讨,通过棚户区改造案例进一步证实多种政策属性影响政策扩散过程中的交叉性与动态性,进而影响政策扩散过程。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动态性使学术界的研究难以涵盖其方方面面,因此政策扩散在未来将会继续蓬勃发展。

2.4 发展趋势

关键词突变代表某个领域研究趋势的转变方向。利用 CiteSpace 的突变系数对 217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突变分析,选择前 10 个关键词,得出政策试点研究关键词突现表(表 3)。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政策试点的发展趋势,清晰地看到政策试点研究领域各个聚类热点的演变过程,制作了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试点一直是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热点。根据表 3 关键词突现以及图 5 的时间线图,将政策试点的研究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 1 阶段(2013—2015 年),以周望为代表的学者将政策试点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实践相结合并展开研究,为政策试点本土化提供智力支持。他们将关注度集中在地方政府在试点中的角色以及试点的发生过程。周望^[21]首次以政策试点为主题在博士论文中展开研究,涉及政策试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特征和理论基础等,尝试解答政策试点的因果机制。2012 年营改增税收改革在上海试点实施以来,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学者们对国家税收试点政策展开研究,但该时期总体发文量较少。

第 2 阶段(2015—2020 年),学者们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政策试点相结合。这一阶段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突现词有“改革创新”“政策创新”“创新扩散”等,众多学者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政策试点的创新

表 3 前 10 关键词突现表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1	地方政府	1.36	2013	2016
2	政策过程	1.26	2013	2018
3	政策试验	0.94	2015	2016
4	改革创新	1.34	2016	2018
5	行动逻辑	1.11	2016	2017
6	现实困境	0.72	2017	2019
7	影响因素	0.84	2018	2020
8	创新扩散	1.06	2019	2022
9	政策实验	0.87	2019	2020
10	府际学习	0.78	2019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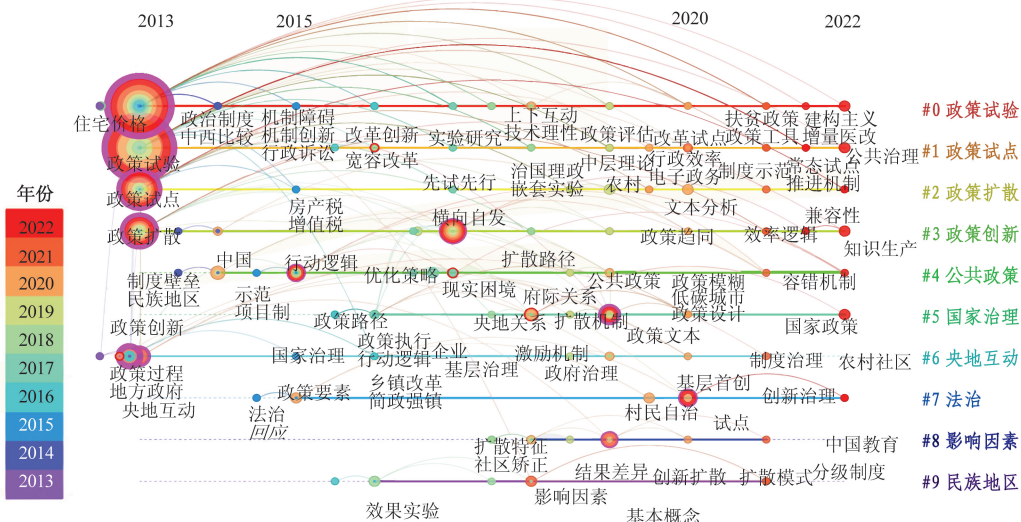


图5 2013—2022年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时间线图

和扩散，研究扩散的机制、过程和特征，探讨政策试点在中国话语体系下何以创新扩散，政策创新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研究视角逐渐放大，政策试点过程中的政府间关系从研究地方政府间关系向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扩展，府际关系成为该时期的重点，不同学者分别从央地互动、横向政府与纵向政府等视角探讨府际关系。同一时期，有学者开始关注影响政策试点的因素与现实困境，如郑永君^[22]以分级制试点的社区矫正政策为例，探讨地方经济和财政水平以及试点政策的属性如何影响试点扩散。姚连营^[23]对浙江省的试点案例进行大样本研究，探讨试点执行和试点扩散中“政策属性”“试点经费”等因素对试点结果的影响，构建了影响试点结果的综合分析框架。在该时期，有关政策试点的相关研究百花齐放，发文量相对较高且集中。

第3阶段(2020—2022年)，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视角成为新的关注点，以杨宏山等^[4,13]为主的学者开始探讨政策试点的微观机制，对政策试点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思路。政策扩散和政策创新等的研究议题逐渐深入，可以预见未来将会产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治理过程中的政策试点、政策工具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等。在该时期，发文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对政策试点的研究。

3 结论与反思

政策试点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过程中被广泛运用并取得积极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了新进展，政策试点立足于现实中国，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拓展了新的实现方式和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运用了 CiteSpace 软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政策试点研究的有效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试点研究经过了3个阶段，2013—2015年是缓慢发展阶段，2015—2020是高速发展阶段，2020—2022是突破创新阶段。该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有明显增长，学术界研究主要围绕政策试点的发生过程、政策试点中的央地关系、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政策试点中的创新扩散4个方面展开，研究内容更进一步深化。

当前，有关政策试点的研究层出不穷，不断在国家治理领域寻求新的突破口。学者们在不断探索并试图构建公共政策过程的中国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而言，政策试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缺失将会限制试点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因此，当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1)要对相似概念进一步厘清。Policy experimentation 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翻译成“政策试验”和“政策实验”，在中国语境之下，其又可以翻译成“政策试点”，三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形式和逻辑上的共性存在明显差异，“政策试验”和“政策实验”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别于“政策试点”^[1]。当前学术界对这三者的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地区分，因此要进一步在政策科学中寻找相关理论资源厘清中国本

土特色的“政策试点”，把握其特征，进一步找准“政策试点”的定位。

(2)要进一步展开实践研究。当前有关政策试点的政策过程论、央地互动论、知识生产论等理论视角多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并且大多都是以单一的形式论述，难以回应中国本土的理论于实践问题，难以揭示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政策试点研究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从大量丰富的试点实践案例中，强化理论层面的论证，使研究方法多样化，推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刘然. “政策试点”“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的概念辨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 40(6): 34-41.
- [2] 黄贵辉, 许正中. 国内行政改革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J]. 长白学刊, 2021(5): 65-74.
- [3] 韩博天, 石磊.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J]. 开放时代, 2008(5): 31-51.
- [4] 杨宏山, 张健培. 政策试点何以悬浮? [J]. 治理研究, 2023, 39(1): 68-80, 158-159.
- [5] 周望. 如何“先试先行”? 央地互动视角下的政策试点启动机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3(5): 20-24.
- [6] 刘伟. 政策试点: 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 基于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政策的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5): 113-119.
- [7] 杨志军. “统一总一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2(5): 85-96.
- [8] 李壮. 中国政策试点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基于 CSSCI 数据库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4): 141-149.
- [9] 朱旭峰, 张友浪. 创新与扩散: 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J]. 管理世界, 2015, 31(10): 91-105, 116.
- [10] 桂华, 夏冬.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 方法与条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2): 75-86.
- [11] 刘志鹏, 高周易, 马亮. 示范: 政策高位推动的工具: 基于国务院各部门的实证研究(2008—2019)[J]. 政治学研究, 2022(4): 63-75, 158.
- [12] 朱旭峰, 张超. “竞争申请制”: 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 170-176.
- [13] 杨宏山, 李娉. 政策试点的理论逻辑与知识生产[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2(6): 109-116.
- [14] 杨宏山, 赵远跃. 政策试验中的多方互动与知识生产: 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4): 15-24.
- [15] 李娉, 杨宏山. 科学检验与多元协商: 政策试验中的知识生产路径: 基于 Y 市垃圾分类四项试点的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3): 71-83, 170.
- [16] 李娉, 邹伟. 权威调控与知识生产: 中国政策试验的双重逻辑: 基于能源领域四项试点的案例比较[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5): 89-96.
- [17] 周望. 连接理论与经验: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的“政策试验”[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2011 年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 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1: 6.
- [18] 刘伟. 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地方政府行为辨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1): 34-38.
- [19] 李智超. 政策试点推广的多重逻辑: 基于我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6(3): 145-156, 175.
- [20] 朱亚鹏, 丁淑娟. 政策属性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5): 88-113, 243.
- [21] 周望. 中国“政策试点”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2.
- [22] 姚连营. 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 417 项试点的实证分析[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50-60, 126-127.
- [23] 郑永君. 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社区矫正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 39(1): 31-36.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Chinese Policy Pilot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WEI Meizh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literature on policy pilo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ite 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draw it into a knowledge map and analyze it, to discuss the hot 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policy pilot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policy pilot studies is on the rise,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occurrence process of policy pilot,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n policy pilot,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policy pilot, and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policy pilot. Based on this,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e policy pilot.

Keywords: policy pilot; policy testing; CiteSpace